

『而已丛书』



鲁迅

教我

①

王得后【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教育出版社
FUJIAN EDUCATION PRESS

『而已丛书』

魯迅

教我

①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教我/王得后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9(2010.7重印)

(而已丛书)

ISBN 978—7—5334—4539—3

I. 鲁… II. 王… III. 鲁迅(1881~1936)—思想研究—文集

IV. I21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5155 号

而已丛书

鲁迅教我(上、下册)

王得后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徐辛庄西)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9

字 数 326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2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4539—3

定 价 57.60 元(上、下册)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题 记

这是我的第二本关于鲁迅的文字的选集。

今年是鲁迅研究室成立三十周年；是李何林教授出任研究室主任的三十周年，是他把我从机修工厂热处理车间带到研究室的三十周年；也是我从业余到专职研究鲁迅的三十年。“三十而立”，可我的成绩是这样单薄，肤浅，自然，也许并不平庸。然而，何“立”之有？不过，我深深感念李何林先生，是他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艰难日子里，想方设法改变了我的命运。今年他逝世已经快二十年了，我只能用这样的东西来纪念他，毕竟很是惭愧。

鲁迅活着的时候，有人说他是“托尼思想”，有人奉他为“思想界的权威者”；他逝世后，有人赞颂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但质疑之声此伏彼起，不但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甚至连什么思想也没有。三十年来，我集中思考这个问题。我思考的结果是肯定的。那么，他“有什么”思想？“是怎样的”思想？他的思想是“为什么的”？我的理由是：我觉得我从他的全部译著中发现了他以“立人”为出发点和中心，提出了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观点。这一系列观点，排列起来，大体是：

一，人是一切人间世的问题——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民族的和国家的——的根本。不是“因素”，是“根抵”。

二，人是生物，生命是第一义的。这种“自然而然”的事实，是关于“人”的问题的根基。

三，人的生命，自然首先是生理的，属于“体格”的内涵。但人有“精神”，即属于心理的内涵。在体格和精神之间，即生理和心理之间，精神是第一

的。人的精神决定“生命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

四，人有两大本能，即食欲和性欲。在食欲和性欲之间，食欲第一，“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

五，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人性中有动物性；动物性是复杂的，并非单一的“恶”或“丑”。人性的参照系是动物性。

六，人性的全面涵养、发展和实现，包含科学和情愫两大类别。科学是“人性之光”。

七，人是群居的，惟有群居才能生存。在个人和群体之间，个人是本位；没有了“个人”，群体即不复存在。“于自己保存之外”，才能做为了群体的事情。但是：“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所以：个人是本位，“民众为主体”。

八，人的觉醒，从说心里话开始。人的群体的觉醒从个人开始。“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九，人类是有性生殖，是两性异体的。人我关系第一是两性的关系。合理两性关系是“自他两利”。“自他两利”的原则适用于整个人我关系：夫妇，家庭，家族，群体，民族，民族间和国与国之间。

十，两性关系中的婚姻关系，是当事人绝对个人的事情，与任何人无关。“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

十一，人类的生存是子子孙孙延续的。“高曾祖，父而身，自子孙，至玄孙”，个个是“中间物”。人类为了发展，也即进化，在父母子女之间，子女第一，以幼者、弱者为本位。

十二，人类的群居构建为社会。人在社会中，自有文字的历史以来，是分裂的，地位、待遇是不平等的。人，被分割成“主人”，“奴隶”和“奴才”。

十三，人一降生，就在既定既成的人际关系之中，认同“奴隶”，谅解“奴隶”；拒绝做“奴才”，憎恶“奴才”。

十四，人被压迫了，为解除压迫的斗争是合理的。“奴隶”惟有斗争才能争取到“主人”的地位。“我们中国的人道怎么样？那答话，想来只能‘……’。对于人道只能‘……’的人的头上，决不会掉下人道来。因为人道

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

十五,“奴隶”的斗争是求解放,不是争夺“虎皮交椅”;不是“翻身”做“主子”,再去奴役别的“奴隶”。

十六,“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

十七,反抗“权势者”,不为“权势者”设计“治国的方法”,不取媚于“权势者”,“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

十八,学界有三魂:官魂,匪魂和民魂。“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其实,整个人界,都是如此的。

十九,“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二十,总之:“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

我现在领会到的是这些。鲁迅“立人”的思想,至少包含这些吧。这二十条,每一条都有鲁迅的原话作证据,都是可以复按的。

可是,自从我发表《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以来,二十五年过去了,我未能把这些心得写成文字。我知道,这是我先天缺乏理论思维,后天的学力严重不足,我偏爱的方法也限制了我。

我的方法是只读鲁迅,通读鲁迅,在通读中发现問題,根据問題再从通读中搜集相关的议论,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补充,是进一步发挥,还是互相抵牾,乃至相反?相反,是相成还是别立一说?然后归纳成为心得。我深知我远没有读通鲁迅;不懂的地方也还多。不懂的就是不懂,我存疑;但决不断章取义,用摘句搭建“一家之言”,强说鲁迅“有什么”和“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更知道,我充其量只是一个祖述鲁迅的人。我没有创造的学力和思想之力。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平生亲历,以及所见所闻,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谈起”。幸运的是,我居然上了大学,学习中文,读到



鲁迅教我

了鲁迅。于是偏爱鲁迅，坚持阅读了五十年，向他求教了五十年罢了。而到鲁迅研究室以来的三十年，所写的东西，都是求教所得的片段心得。我自知它们不一定符合鲁迅原意。但五十年求教的诚心是可以自白的，也即以“鲁迅教我”为书名。是也非也，敬待读者明教。

我感激每一个阅读这本小册子的读者。

我尤其感激给我提出批评，给我指教的读者。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题

记

题 辞

谨以此书纪念

鲁迅研究室成立三十周年暨研究室主任李何林教授



目 录

题 记	(1)
鲁迅研究一个重要方面军的代表	(1)
——纪念李何林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	(17)
鲁迅思想中的人性问题的	(42)
附:鲁迅为什么憎恶李逵	(63)
“立人”:革新生存的根本观念	(66)
“立人”就是立文化	(72)
附:国民性是根本的政绩	(75)
鲁迅的文化意义	(78)
人类生存的困境与鲁迅的文化创新	(83)
从鲁迅出发,回到人类生存、温饱发展的抗争	(96)
——为 1993“鲁迅研究的新路向”研讨会而作	
鲁迅思想的否定性特色	(103)
鲁迅与传统	(123)
鲁迅与科学	(136)
鲁迅做了哪些文化工作	(151)
鲁迅在二十一世纪	(161)

奉答《东方早报》赵岚先生	(187)
《新青年》九十华诞与“读经运动”	(201)
附：请读一段经	(206)
关于鲁迅财富观的笔记	(212)
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	(221)
鲁迅在仙台：期待超越的一页中日交流史	(241)
——为“鲁迅的起点：仙台的记忆国际学术讨论会”作	
希望的失落	(252)
鲁迅说杂文	(259)
鲁迅：“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	(278)
鲁迅赠景宋自作集的题词	(290)
赵瑞蕪先生著《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读后感	(298)
王宏志著《鲁迅与“左联”》读后	(305)
林贤治著《人间鲁迅》读后	(316)
孙郁著《二十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试评	(320)
读《假如鲁迅活着》	(327)
当下小说家对“国民性”的追寻	(338)
对于鲁迅的发现和解读	(342)
——和钱理群学兄讨论	
献词	(359)
《鲁迅五书心读》献词	(361)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序	(364)
《恩怨录》序	(369)
《鲁迅与周作人》序	(372)
写在《鲁迅书信的笺纸》前面	(375)
《寻找鲁迅》编后记	(381)
写在重印本《思想·山水·人物》前面	(386)
《鲁迅杂文全编》前言	(392)



《鲁迅杂文全编》编者的话	(416)
《鲁迅杂文基础读本》编者前言	(423)
写在《鲁迅教我》后面	(429)
致谢	(443)



鲁迅研究一个重要方面军的代表

——纪念李何林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是李何林先生诞生一百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李何林全集》已在今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最好的纪念。它使先生的著述能够完整地传世，供后来者研究与评议，而令一切谬托知己、中伤攻击难以得计于长久。

李先生是一个心怀坦荡、质朴方正，以继承和发扬鲁迅的理想为己任的学者和教育家。在《全集》借用的“代序”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自评：“五十年来（1929～1983）我所编写的书文，成本的和成篇的，长长短短总共大约不到一百万字，和五十年的时间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平均每年不到两万字，算什么作者呢！至于质量，则既少发现，又缺创见；不过在一面教书，一面学习备课的过程中，把教和学的结果，编成一些书文，供同行和青年们参考。由于以上的缺点，有些已被时间淘汰了，而又敝帚自珍，选了这样一本，留下一点我所走过的文学生涯道路的足迹，也可以从中看出我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界的一个不重要的方面。”^①这是真诚的谦虚，显示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②的理智。但他更自信“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界的一个”“方面”。这两方面都显示着庄严的生活态度和品格，这就是一种宝贵的精神遗产。

李先生鲁迅研究的学术遗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终身信奉鲁迅思想，把它作为自己革命一生的指南，并希望推己及人，因而力主向青年普及鲁迅，宣讲鲁迅；二，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鲁迅，尽己所能解读鲁迅思想，不唯上，不阿世，不讲情面，不为流行的时尚观点所左右，心怀坚

定的对鲁迅的信仰，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特操；三，对于鲁迅作品，运用逐字逐段的“串讲”的方法，细心地严谨地领会鲁迅的思想。他的创见与不足，都表现在对作品的“串讲”之中，证实与证伪，一一可覆。这种“串讲”的方法，开今日“细读”“精读”鲁迅的先河。

一

李先生少年时幸逢新文化新文学的兴起。自述喜欢“当时的《新青年》、《新潮》、《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小说月报》、《少年中国》等”，“接受了当时的科学、民主、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剩余价值、无政府主义等等粗浅的影响”。^③在国立东南大学农学院生物系学习两年之后，因经济困难，遂投笔从戎，于一九二六年秋到武汉参加北伐军。随军参加二次北伐；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转战到广东，失败后返回故乡安徽霍丘。一九二八年因暴动失败，出走北平，避居于未名社，从此投身革命文学事业，出版了《中国文艺论战》和《鲁迅论》。这两本书虽然是编辑的，但所收文字的资料性，论辩性，特别是鲜明的信奉鲁迅的倾向性，奠定了李先生的鲁迅研究的基础。

参加北伐，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遭受失败之后，各人的人生道路是各种各样的。高升的，退出的，逃避的，隐匿的，背叛的，坚守的——坚守武装斗争岗位和坚守革命立场与志向而从事其他职业的，都大有人在。李先生就是把自己革命的立场与理想以及战斗风格和鲁迅研究结合起来。鲁迅是他的信仰，是他的行动指南，而不是书斋里的文库——那怕是思想的文库和教师手里的高头讲章。这是李先生鲁迅研究的第一个特点。看小处，他在六七年的时间里，相继任教于焦作工学院，太原国民师范，太原师范，济南高中，北平中法大学各高等和中等学校，就因为他在自己的教学中，坚持讲授鲁迅和进步的教材，宣传革命的思想，不容于学校当局而被解聘。他这样不怕一再失业，坚持鲁迅的方向，是什么精神？看大处，他

一生因从事革命，从事革命文艺，多次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或上“黑名单”，如霍丘暴动失败后，“李闻事件”后，许寿裳先生被暗杀后，他依然不改革命之志，继续斗争，是什么精神？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精神；“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④。

李先生鲁迅研究的第二大特点，是对于攻击、反对鲁迅的做法和言论决不宽容的抗争性，自觉承担保卫鲁迅的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鲁迅逝世的时候，李先生的《为〈悼鲁迅先生〉的愤言》和《叶公超教授对鲁迅的谩骂》是别具战斗风格的悼念文字，这在《鲁迅先生纪念集》中是非常醒目的。李先生晚年，一目几乎失明，仍然一笔一画亲自撰写万言长文《为鲁迅、冯雪峰答辩（读夏衍〈懒寻旧梦录〉，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雪峰逝世十周年）》。古人有言，“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想，也就是这样的人品与人格吧。

李先生鲁迅研究的这一抗争性的战斗风格，最难能可贵的是，一，不唯党内文艺界的领导是从，在维护鲁迅与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发生尖锐矛盾的时候，敢于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他在“革命文学”论争，“左联”解散和“两个口号论争”的三大问题上，始终坚持认为鲁迅是正确的，决不随风转舵。改革开放以后，对于上述三大论争，鲁迅研究室作为发起单位之一，曾经和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三所高校轮流召开讨论会。李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会上遭到抵制，随后又遭到宣传部门的红头文件的禁止，但是当他看到《北京大学学报》发表有关文章后，立即对有关部门领导表示，“我们也要发表意见”。就这样冲破禁令了。不知道是幽默还是挖苦，李先生为此曾经被称为“你是一个方面军的代表嘛”。但是，李先生绝不是固执己见、容不得批评，是个不改正“错误”的人。他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自评》就是通过认真讨论，加强学习，接受同志批评，加以“改正”的实证。改革开放以后，有人对他的《自评》提出质疑，甚至直言他原先的见解不错，他依然不为所动，认为自己的“改正”是对的，是应该的。这可以看出，他的《自评》不是出于压力下的“违心”之作。而在阴谋发动的对于他的《十年来文学理论

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的政治性“大批判”中，他据理力争，抗辩到底。在“文革”浩劫中他对待大批判也是这样。南开大学中文系在他逝世后的悼词中，称赞他“在动乱期间亦不改常态”，是中肯而实在的评价。二，在原则问题上坚决维护鲁迅，不讲情面，不怕得罪前辈和老朋友。他决不世故，决不折衷，决不沉默，总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为保卫鲁迅而抗辩。改革开放以后，茅盾先生带头指责鲁迅对胡风等人“失察”，鲁迅研究也有“两个凡是”，“神话”了鲁迅，形成了一种小思潮。李先生带头进行论辩。发表《鲁迅研究中有“两个凡是”吗？》、《也来澄清一些事实——答茅盾先生》以及《鲁迅研究中要勇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敢不敢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鲁迅？》和《鲁迅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茅盾是李先生1926年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时的口试官，切身的前辈；又是中国文学界旗帜性的领袖人物，德高望重，要指名道姓针锋相对地发表对他的驳论，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绝非容易和轻松的事。

在鲁迅研究上是这样，在政治生活中也是这样。李先生对待胡风、冯雪峰和所谓“右派”，他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保留。吕剑、赵宗珏二先生有诗吟咏自己的感受，最后道：“不错，我读到了/你的正直和坦荡，/你的境界和情操。”^⑤谢韬先生的七律二首有句云：“友直友谅千古鉴，品高品节万人传。”^⑥中外古今，各个民族各个时代，文化不同，且时有嬗变，但对于知识者，其要求“道德文章”的一致，是有共识的。这就是因为在一个人身上，道德和文章并不天然合二而一。文章高手，却是公德败坏者，古今中外，代不乏人。尽管，势异时移，情随事迁，甚或，“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⑦，使后人原谅他的公德亏损，而推崇他的文章。但是，这种政治和公德上的亏损，毕竟为大多数有平常心的人所惋惜，所不忍，所诟病。是的，即使在生死存亡的流血暴动、起义，革命的时代，无论对外反抗侵略还是对内反抗暴政，人群两极极端分化，知识者的人生态度，人生道路，政治与公德的选择也并不一律，何况今天人们对多元化多样性的认识高度自觉的时候。然而，对于文章，政治，道德分裂的事实，“承认”多元化多样性是一个问题，“包容”是一个问题，

“认同”是一个问题，“选择”“效法”乃至“跟进”又是一个问题。事实上倡导宽容的大家，对于并不“认同”他的“认同”，尤其是并不“选择”“效法”和“跟进”他所“选择”“效法”和“跟进”的“某一化”的人们，是从来都不宽容的。过去和现在倡导“宽容”的大家，谁“宽容”过鲁迅？如今或人的旗帜的胡适先生，他那最为人标举的答苏雪林信，其中“鲁迅狷狷攻击我们”，固然可以化为“小节”，或偶一失手，然而那“凡论一人，总须持平。……此是‘gentleman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敌党”是什么呢？“敌党”不是“论敌”，大概没有疑义的吧？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法西斯统治下，当时正在剿灭共产党，“敌党”一语包涵的“杀心”还有疑问吗？还谈什么宽容！主张“宽容”的学者教授，对严肃认真、诚恳研究鲁迅的人和文章，谁又“宽容”过呢？“宽容”不“宽容”，主要不在知识者之间。知识者写文章，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悉听尊便，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相轻也不妨，批评反驳，用语平和很好，气不可遏，嬉笑怒骂，也是人情之常，但最好止于嬉笑怒骂，而不“辱骂和恐吓”。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甚至以言治罪，以思想治罪的“党国”专制下，“敌党”不是好玩的。胡适是明白人，他说“左倾是一事，反对政府另是一事”。可惜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竟认定“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⑧胡适们在哪一个“保障人权”的国家，发现了“敌党”呢？“李何林攻击”^⑨云云，这种用语不就是“攻击”吗？

二

李先生长期从事文学教学，发表文字很少。每有所作，都尽力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和毛泽东的鲁迅论自然而然成为他研究鲁迅的信条。对于瞿秋白他还不尽认同，对于毛泽东，特别是“三家”“五最”和鲁迅后期“学会了辩证法”“没有片面性”的论断，是完全遵奉的。这在李先生的时代尤其是在李先生这一代以

鲁迅教我

革命战士之身来研究鲁迅的前辈是天经地义的。而他对于瞿秋白论断的提出异议，倒可以显现他严谨解读鲁迅文本的“实证”学风和理论的原则性，是很可宝贵的。

李先生明确认定鲁迅“是一个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伟大思想家’”^⑩，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⑪这样的评价，在他那个时代是对鲁迅的最高的评价，同时是给予鲁迅的最高的荣誉。但在事实上和理论上却留下了一个大问题。这就是鲁迅的“前期”的思想，他“前期”对于“根柢在人”的“立人”^⑫思想及其“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和“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⑬等人生要义以及对于社会、文化的独到而卓越的思考，怎样评价呢？“前期”和“后期”的思想是怎样的关系呢？

李先生认为，“对鲁迅后期思想没有什么争论，后期在政治上是共产主义者，在思想上是辩证唯物论者、历史唯物论者。对后期大家没有什么分歧意见”。^⑭这在他的时代，大体是事实。但也因此使得对于“后期”的思想疏于研究；更未能研究鲁迅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后和他“前期”的区别在哪里？

李先生把鲁迅一生分为三期：“1907年～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姑且叫它‘早期’）；1917年～1927年，‘五四’前后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叫它‘前期’）；1927年～1936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叫它‘后期’）。 ”^⑮

对于“鲁迅的早期思想”，李先生的结论是：

《人之历史》宣传进化论思想，详细介绍了19世纪欧洲几个进化论学者的学说，表示鲁迅对进化论已有研究，受进化论的影响很早。

《科学史教篇》认为人类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是由于少数科学家的天才创造，而是由于人民勤劳和工商业的需要；认为科学与